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上册

雍正元年正月至雍正三年十二月止

黄山书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总编审 关孝廉 屈六生

翻译 王小虹 安双成 关孝廉 张凤良 沈原 屈六生 赵玉梅 栗振复

特邀通审 王熹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上册

雍正元年正月至雍正三年十二月止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1998.8
ISBN 7-80630-308-1

I. 雍… II. 中… III. 奏议-译文-中国-清代-雍正(1723~1735) IV. K249.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0821 号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印张: 183.375 插页: 4 字数: 4694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 册

(上下册)定价: 800 元



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

蔡美彪題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编 委 会

主 任 邢永福

副主任 杨继波 屈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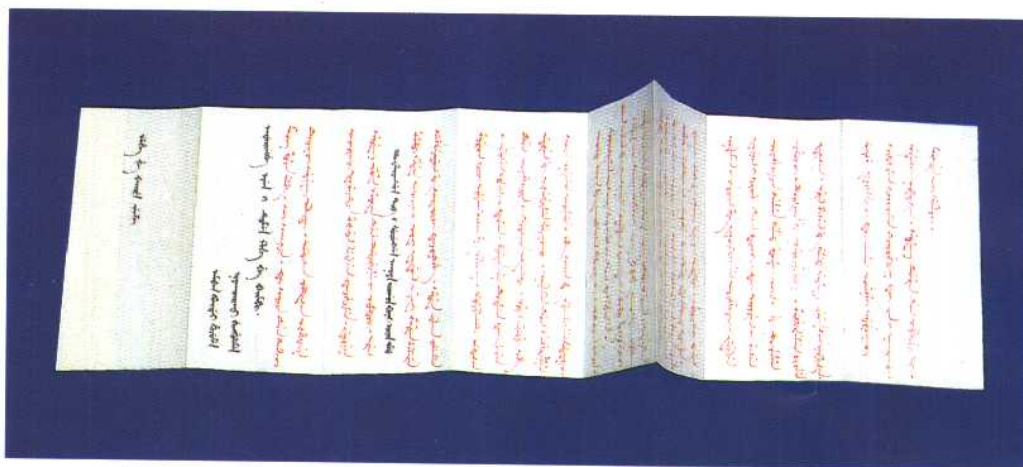
编 委 邢永福 杨继波 屈六生

关孝廉 王小虹 赵玉梅

总编辑 赵国华 张英聘 孙红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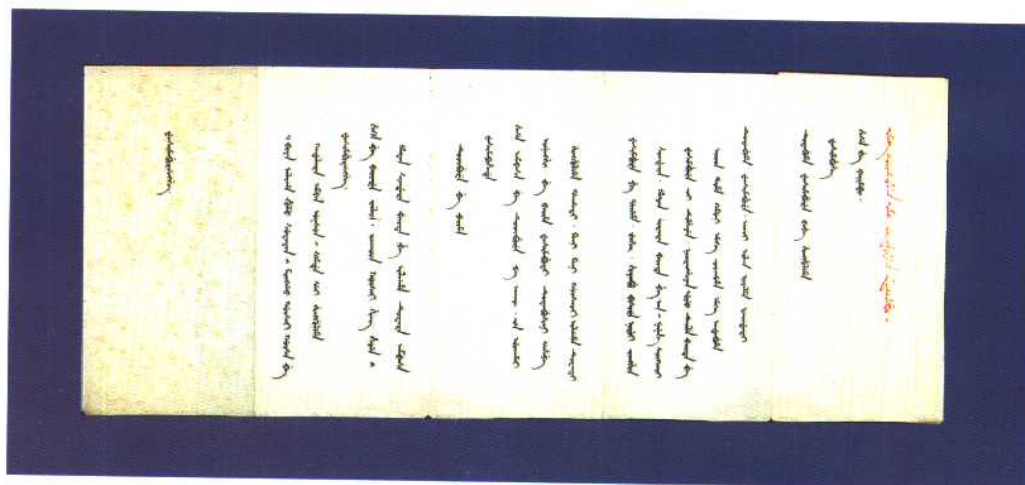
清雍正帝胤禛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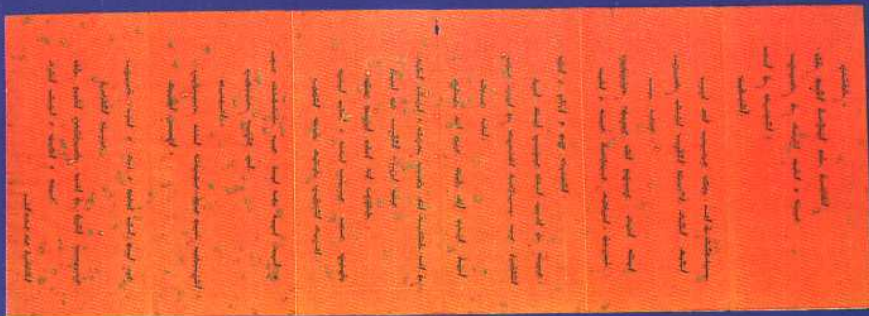
征西将军祁里德请安折图影



两江总督查弼纳请安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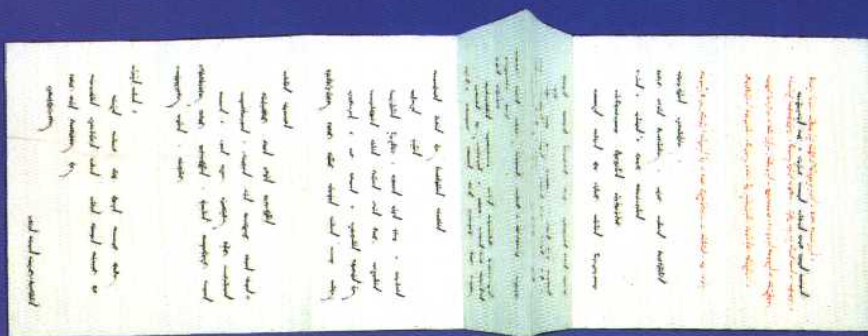
都统申穆德等奏事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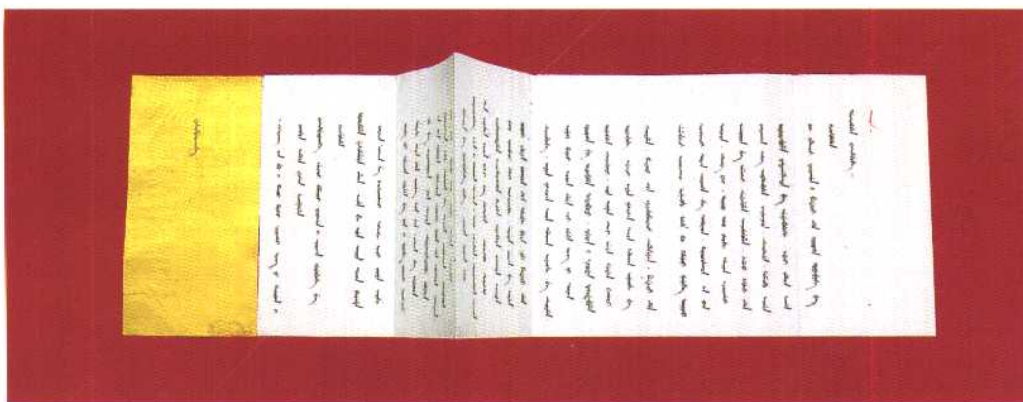
将军巴赛等庆贺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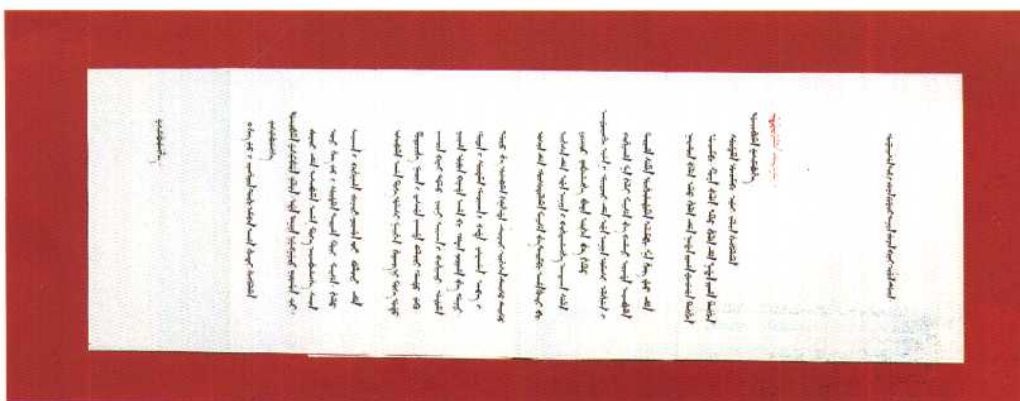
礼科给事中兆华奏事折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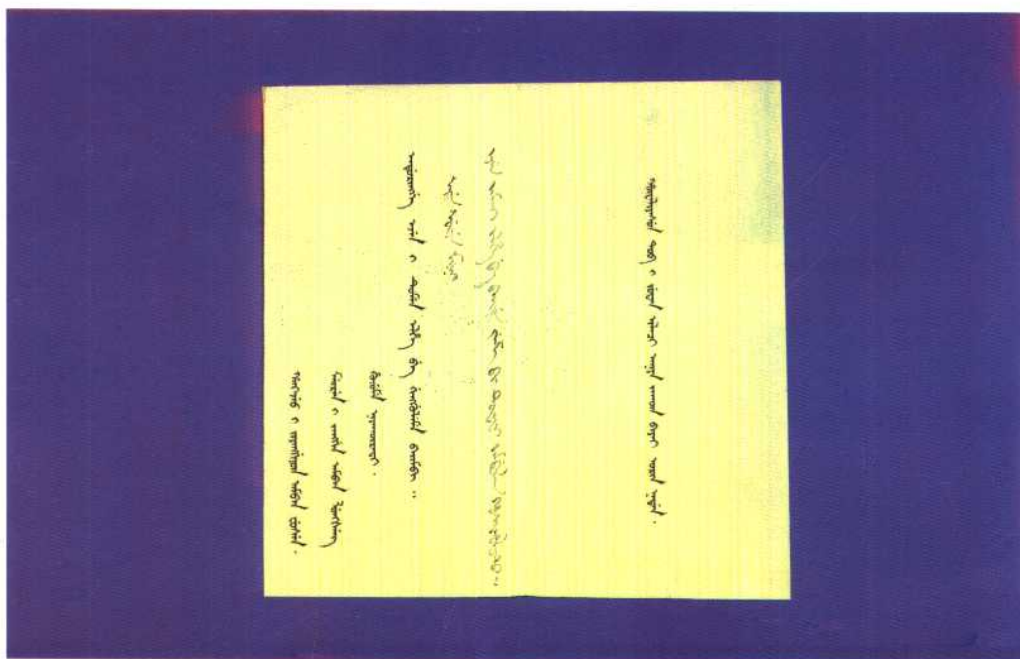
副将军丹津多尔济奏事折图影



满洲水师营副都统傅森奏事折图影



荆州将军袞泰奏事折图影



杭州将军傅森等请安折图影

序 一

邢永福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经过我馆满文部业务工作人员多年辛勤劳动,终于正式面世,可庆可贺。作为《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姊妹篇,可说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它的面世,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清代前中期史、清代边疆民族史,乃至清代宫廷史等都具有推动作用。

我曾在中央档案馆、档案出版社工作多年,后又调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任职,深知满文档案史料之珍贵,翻译出版之不易。1985年《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由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1987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也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而满文朱批奏折因为翻译难度大、周期长,考证释疑,费时费力。满文部编译组全组人员齐心协力,不懈努力,发扬了不畏艰苦,不图名利,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的精神,终于完成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它是满文翻译工作者多年成果的结晶,也是翻译大型编年体档案史料的又一部力作。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满文部翻译组研究馆员关孝廉、屈六生、安双成、栗振复,副研究馆员张凤良以及王小虹、赵玉梅、沈原同志。最后由关孝廉、屈六生同志统编定稿。

清代雍正朝只有十三年时间,虽较短促,但承上启下,十分重要。康熙皇帝为中国封建社会少见之英主,而晚年吏治松弛,失之于“宽”;雍正皇帝一扫因循怠惰之风,大力整顿吏治,清理财赋,改革政府行政体制及文书制度,设立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表现出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的魄力。然而,在对待政敌和处理政务上,又难免过于严酷,是应该否定的。尽管如此,由于有了雍正皇帝在位时的大力整治,

2039/02

才保证了乾隆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继续向前发展,最终统一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中国,使清朝的统治达到鼎盛时期。因此过去称“康乾盛世”,并不十分准确,应该是“康雍乾盛世”。这是因为,正是雍正时期的诸多改革和努力,才为乾隆盛世创造了条件。

我馆馆藏满文档案数量巨大,根据初步统计,达二百万件之多,约占我馆馆藏档案总数的五分之一,占全国满文档案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我馆始终重视满文档案的翻译与整理工作和满文档案翻译人才的培养工作,将此作为一项大事来抓,积极鼓励开展有关满文与满文档案的研究、教学工作和学术交流活动,这些年可谓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从编译工作看,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出版了十余种、一千余万字的史料。并从1986年起,先后有《清代中俄关系史料》、《满文老档》、《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等十项成果分别获档案学、满学优秀成果奖。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工作也取得长足进展,不但详细整理了军机处全部满文录副奏折近20万件,还将目录输入电脑,准备建立数据库,内阁满文题本的深加工整理也已过半。但这些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与满文档案总数相比,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已编译的档案只占满文档案总数很小部分。军机处、内阁、内务府、宗人府、黑龙江将军衙门等重要全宗档案,还未曾涉及。就宫中全宗满文朱批奏折而言,也仅仅刚翻译了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二朝档案,从乾隆朝开始,满文朱批奏折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有责任、有义务,进一步加快满文档案整理编译步伐,争取把这批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高标准、高质量的编译出来,奉献给社会。

一九九八年六月八日

序 二

张 德 信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通史和断代史的研究,无论在开拓领域、出版成果,还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利用和开发,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在断代史方面,明清史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明清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开始为世人所认识,所重视;其次是明清时期遗存的丰富典籍资源,如实录、官书、正史以及文集、笔记、小说、方志资料,特别是数量巨大的中央档案和地方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为后人深入研究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概貌,提供了大量的更为直接的依据。客观而论,在这些典籍中,官方如藏于秘府的御批档案的特殊作用是其他文献所不能替代的。这是因为,它绝不是只言片语的残缺史料,抑或可有可无的一堆故纸,而是可以对文献史料起到补其阙,述其详,纠其谬的作用。因此,对文献材料与档案材料的充分理解和正确运用,便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也才能使我们有可能将某些历史事件、人物活动、战争场面的情景描绘得更切合历史实际,并从中给人们以生动的历史启迪。从而使我们的研究领域愈来愈广,路子愈走愈宽,成果更多。

历史研究要以史实为依据。丰富的明清档案,确实为研究者提供了其他断代史研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编辑出版《康熙朝满文朱批

奏折全译》等系列满汉文档案史料之后,现又编译出版《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奉献给中外学者,这对中国通史和清代历史研究来说,的确是可喜可贺的事。

清承明制,这是史学界通常的说法。其实满族统治者在继承明制的同时,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充分表现出了其励精图治,积极向上,勇于开拓,兼容并蓄的民族特性,大大丰富并完善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内容,创立了许多较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从而谱写了清前期国泰民安,政治一统,多民族共存的“康雍乾”盛世。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出版,为我们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安邦治国的卓越成就以及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开创盛世,超越前代,缔造多民族统一封建帝国的深层原因,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史料依据。

清史在断代史研究中可资利用的资料最为丰富,研究成果颇多。而对雍正朝的研究,由于语言文字的缘故,使许多研究者无法充分利用满文档案资料,从而影响并局限了人们的研究视野,留下诸多遗憾。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的翻译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历史性的缺憾,也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研究清朝前期历史以及雍正帝时代的伟业,评判已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和衡量尺度,这对开拓清史研究视野和领域,并将其引向深入,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值此《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出版之际,思绪万千,感慨良多。如此嘉惠学人之善举,功德无量,当大力宣扬。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于东厂胡同一号

序 三

马 大 正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由古代社会向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开端和起点。其前期,既出现过延续达138年之久的“康雍乾盛世”,更有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和睦的封建统一大帝国时代的夕阳余晖。其中,雍正一朝(1723—1735年),虽然仅有13年的历史,可谓短促的弹指一挥间,然而它的承上启下作用和雍正帝的诸多影响所及,却是其它时代所无法替代的。

作为雍正朝“盛世”开创者的清世宗雍正帝,是一位政治上有远见卓识、统治手段干练坚决、施政作风雷厉风行的统治者。同时,他又是一位推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改革家和实践者,其推陈出新意识和举措,远在诸多帝王之上。然而因其“夺嫡”一说的存在,却颇遭后世责难,致使“瑕”掩其“玉”、“过”盖其“功”,加之重要史料的阙如,研究者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使诸多问题至今或涉足者寡,或莫衷一是,难成定论。

新近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译、黄山书社出版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不仅为研究雍正朝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而且在历史资料运用方面开拓了新的途径和天地。从而使海内外众多研究者得以开启历史沉湮多年的“门户”,步入其“殿堂”,探察其本来面目。由此可知本书编译者、出版者的辛勤劳作,真可谓功德无量。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对雍正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宫中活动等均有较详的记载。尤其是对雍正帝的治国思想、安邦之道、用人之术、军事谋略、文化政策、谕民教化、社会风尚、家庭教育、宫中生活情趣旨向的形成、发展、演变的轨迹有更为详真的载录,为其它史料所不能替代。

通观全书,并与该期同类的汉文载录比较,该书在内容、史料价值诸方面,有

六大特点,值得世人注目:

特点之一是真实性。《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所收录、编译的朱批奏折,是清代最珍贵、最具特色、最有政治权威性和机密性的历史档案遗存之一。其书,既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珍藏的满文原件,也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原件的复印件。两者合而为一,成为完整的系列。其内容的原始性、真实性、可靠性无容置疑。通过这些高度机密的满文折奏和雍正帝的满文朱批谕旨,既可明瞭诸多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解开某些历史谜团,又有助于窥知雍正帝的政治心态及其治术的真面目。

特点之二是实证性。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编译的满文朱批奏折,均是雍正朝文武大臣及其亲信对有关军国大事发生发展的“实”具、“实”折、“实”奏与雍正帝朱批的“实”意、“实”图、“实”谕、“实”策。同时,它也是特定历史时代、特定事件、特定人物、特定权力集团演变和荣辱沉浮过程的“实录”。海内外读者和研究者,通过查阅利用这些具有历史“实证性”的满文档案资料,参照其它汉文档案、文献史料,相互比勘,将会对诸多历史事件的过程及内幕,有更加清楚翔实的了解,进而使认识与研究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特点之三是广博性。《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从内容而言,所包容、涉及的方面极其广博。雍正帝实施的一些重大政治、军事、边疆、外交举措,改革行动,诸如打击政敌集团势力,清理财政,设立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八旗事务;实行改土归流,平定边疆军事叛乱;禁天主教,驱逐西洋传教士;划定中俄边界等,在满文朱批中,均有较详的载述。该书的出版问世,将对雍正朝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边疆史、社会史、宫廷史、宗教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无与伦比的宝贵依据。

特点之四是宏富性。从特定意义上而言,《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公诸于世的珍稀满文朱批奏折,本身就是一个档案史料宏富的资料库。这些不仅表现在朱批奏折内容丰富,涉及朝政的各个领域,而且就朱批谕旨本身来看,雍正帝的朱批既是对军政大臣呈奏事项及处理办法的直接谕示,又是对执行政策与改革

意图的阐释。因此,其“宏富”的特色,在档案内容的广度与深度上,可使雍正一朝的历史,得以准确、科学、立体、多元的生动再现。

特点之五是独具性。《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收录的奏折、朱批,在文字上均使用与汉文有别的满文,以增强机密性,使用臣下折奏这种特定的官方文书形式,以与题本、奏章相区别;奏折均由雍正皇帝亲自审阅并加朱批,以显示其权威性;满文朱批奏折,经编译者的考订、编译成汉文后,使海内外的研究者,在检索、阅读、使用时,更为快捷方便。

特点之六是特定性。有清一代,高级官员普遍实行奏折制,始自雍正朝。它的实施,既是雍正皇帝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举措,同时与朝廷中实施军政大权的核心机构“军机处”的建立有关。清政府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官及地方两司以上、武职副都统、总兵以上大员,才有权具折奏事。具折官员须派员或通过驿递,直接呈进,由皇帝拆阅并用朱笔批谕。凡经朱批者,即称朱批奏折。雍正元年(1723年)明令,凡经朱批者,在发还具奏人遵照执行后,必须定期缴还皇宫保存,这使大批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得以传承至今。但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却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故尤为世人所珍视。然因其语言文字上的缘故,迟迟未能编译出版,公布面世。现在,这项工作终得圆满完成,实为史学界,特别是清史学界的一件幸事。

雍正一朝,时间虽短,但却风云变幻,新政迭出;平定边乱,用兵频繁;驱逐教士,与俄订约;推行保甲,强化宗教;立军机处,行奏折制;耗羨归公,官吏养廉;惩治贪官,清理财政;摊丁入粮,豁除贱籍;改革八旗,削弱王公;减少政争,秘密立储;文化专制,兴文字狱;西南边疆,改土归流等等历史事件,在该书中均有涉及和反映。因此,海内外学者研究分析这些公诸于世的珍贵史料,肯定会对过去已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有新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

有感于此,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

序 四

周绍泉

从1898年下半年发现有字甲骨至今,恰好一百年。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即1899年以后,汉晋木简相继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居延面世。敦煌石窟的宝藏——敦煌文书则在1900年重见天日。历经磨难、劫后余存的“大内档案”——明清故宫档案,在本世纪初才为人所知。上述甲骨文、简帛、敦煌文书和明清故宫档案,被誉为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在甲骨文发现后差不多整整六十年的1957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见诸报端,这就是徽州文书。

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五大发现而出现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和徽学,有的已成为世界的显学。进入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建立以明清故宫档案和各地收藏的明清档案为研究对象的明清档案学。这个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的历史学的发展表明,新资料的发现,促进新学科的产生。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我国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史学却委靡。究其原因,大凡是“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陈寅恪语)那时的学问的对象只限于书本,而书本又以经书为主体,经学又只要三年通一经,便为专门之学。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余绪延至本世纪初,有人仍固守几本经书不放,甚至说:“八部书外皆狗屁。”

我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是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历史文化的四大发现,特别是以甲骨文和敦煌文书的发现及由此而导致甲骨学和敦煌学的建立为契机而实现的。当时学者多为新发现的资料而振奋,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些新发现,使人们